# 回歸十二周年感懷

（律詩三首）蘇 生

一

時輪運轉一揮間，九七回歸十二年。
歷劫明珠更璀璨，經霜荊紫最芳妍。
抗防流感萬民福，蓬勃金融百尺竿。
耀眼圖騰今勝昔，弘揚兩制獻瀛寰。

二

歲月崢嶸十二春，弘揚兩制氣氤氳。
創新科技興改革，蓬勃金融採馥芬。
市邑繁榮千貫集，香江鼎革一天新。
抗防流感仁德立，萬里長風沐百芹。

三

披荊斬棘不言休，十二征程歲月稠。
數度金融抗風暴，幾番渡虎逐江流。
仁風萬里龍光照，霧散千山景色幽。
兩制弘揚凝衆志，群賢協力續春秋。

# 厄普代克喜愛的作家

陳 安

約翰·厄普代克今年一月病故的消息令人意外，因爲他才七十六歲，尤其因爲他一年出一本書，直至去年還在出書，一生出了近七十部長篇小說、短篇小說集、詩集、散文集、評論集，使人覺得他有着強大的生命力，應可活至八九十歲的耄耋之年。

最近瀏覽有關他的一些文字資料，發現他之所以想當作家，是受了他母親的影響。他母親有康奈爾大學的英語碩士學位，卻在商店當營業員，業餘便發憤寫作，一心當作家。厄普代克自幼就常見母親坐在打字機旁，他記憶中的家有一種打字機聲所造成的神秘的追逐氣氛，是母親把她的願望植入了他的頭腦。母親在兒子成名很久後才出了兩本書，有人問她如何看待她兒子的大名聲，她冷靜地答道：「我倒願意是我自己。」厄普代克之所以成爲大作家，一是天賦加勤奮，二是愛讀書，受到不少作家的影響。他在一次記者採訪時說，他從小喜愛的作家包括詹姆斯·瑟伯、莎士比亞、陀思妥耶夫斯基、J·D·塞林格、普魯斯特、喬伊斯和亨利·格林。

他說，瑟伯是他十一歲至十八歲期間崇拜的偶像，這名幽默作家、畫家向他顯示了美國之音和詼諧氣質。那時他常省下每分錢去買瑟伯的新書。十二歲時他給瑟伯寫過一封仰慕信，瑟伯回贈他一幅畫，他把畫裝入鏡框，到哪兒都隨身帶着。上大學後，他讀得比較多的是莎士比亞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另外還有塞林格，後者打開了他的眼界，使他明白了怎樣把生活中幾乎沒有關聯、或僅有一絲聯繫的事情編織成一部小說。

大學畢業後，他開始閱讀普魯斯特小說的英文譯本，這名法國大作家的洞察力、哲理性和長句型都使他入迷。後來他又讀亨利·格林的小說，這個英國作家現在已幾乎被人遺忘了，但他確實視之爲小說大師，在寫《兔子富了》時明顯感到格林文風對他的影響。

愛爾蘭作家喬伊斯的《尤利西斯》對他也有很大感染力。書中莫莉和布魯姆的長篇內心獨白，他讀時感到非常興奮，體驗了那種觸及人生經驗實質的新手法。不過，對他而言，喬伊斯只是他呼吸的空氣，普魯斯特、格林和塞林格才深植在他腦中，似乎眞地在幫助他逐步提高，教他怎樣處理他自己的素材。

# 人不可貌相

段懷清

俗話說，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但在現實生活中，又常常發生以貌取人的事情。

我長期生活在大學校園內，校區大門口有一報攤。儘管完全可以在郵局訂報，而且也有贈送的報紙，但我還是習慣天天到門口報攤買報。家人也不嫌煩，反倒覺得這是我每天離開電腦出去「放風」、稍事休息的難得機會。其實，我自己知道，每天這樣一次「何妨一下樓」，對我來說是難得的「接地氣」的機會——住在樓上，如果沒有其他事情，一天到晚不下樓，人高高在上，慢慢地，生命就與地氣越來越遠，時間一久，身子也就會空虛漂浮起來，甚至辨不清東西南北了。

樓道裡常有婦人們牽了寵物狗下樓遛狗，我無寵物，所以孤身一人下樓遛自己。說是「遛」，其實也是目的地明確——到校門口買了報紙就回來。一路所見所聞，似乎已足以讓我每天保持着與一個具體的時間空間之中的日常生活之間必要的接觸，說出來的話，做出來的事，也就不至於像身體一樣老是漂浮在半空中，不知天高地厚。

門口報攤換了幾次主人——最近一次「變更」的結果，是原來的打工者，變成了新主人。一個報亭頂下來需要多大投入，我沒問，也不清楚。但就這樣一個報亭，除了主人夫婦每天起早貪黑，還需要一個看攤賣報的僱工。現在的女主人，其實原來就是這個報亭的僱工。

新來的女僱工是一個三、四十歲的婦女，看上去倒讓人一下子想起在北京或者北方某城市街頭所見的那些北方婦女：身體略有些發福，一種與某種生活之間很是熨貼的感覺——她們與那種生活之間的關係，沒有一絲一縫的縫隙，彼此完全脗合，就是那種感覺。坐在報亭裡，她不會讓你產生任何不大協調的怪異感覺。每次經過報亭，你不會有任何陌生或者新奇的感覺，似乎一切都沒有改變，儘管現在坐在報攤後面的，是一個完全陌生的人。

但其實這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人。原來的報亭女僱工，也就是現在的報亭主人，基本上就是一個賣報人——人家來買報時就賣報，無人買報時就在報攤裡面清理報刊雜誌，終歸是一個忙碌的人。而這位新來的報亭女僱工，別人來買報時，她還會跟你講幾條你要買的報紙當日頭條新聞，或者議論下報紙上面的新鮮事兒。更讓我沒有想到的是，她竟然在我去買《參考消息》時，跟我談起了美國新任總統奧巴馬在埃及開羅大學的演講！這讓我極爲震驚，回去後說給家人聽，家人也覺得不可思議。更讓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是，我每次去報亭，都發現只要沒有人買報紙，這位新僱工就坐在報攤後面讀報，那種讀報的姿勢，也很是大氣豪邁，全然不像是一位女子的舉止。這種報紙與讀報人之間所形成的奇妙的反差，讓人震驚之餘，亦生好奇，不過我終究沒有興趣去打聽這位賣報——讀報人的故事。

如果說這是我親眼所見的一次人不可貌相的故事，另一個故事則是聽說來的。

內地一所大學的領導，率團到台灣參訪，其間爲一台灣民間學者的儒雅風度和學問所吸引，遂當場邀請此人適當時候參訪該領導所主政之學校。後此人果然應邀而來，領導也踐約爲其主持了一次學術講座，並邀其主政學校的大牌人文學者們前往捧場。既然是領導邀請來的客人，又是民間學者，前來捧場的教授們自然知道所謂的「潛規則」，亦或應有之禮貌。不想此相貌堂堂之學者，講座水平實在不敢恭維，以至於其中一位應邀來捧場的教授實在聽不下去了，站起來對着主席台上座的校領導說：領導，你是不是被忽悠了？

在一個才能、機會和秩序都公平合理的社會，上述這樣以貌取人的可能性大概會少一些，不過依然還是會有另外類型的人與相貌之間的落差事情發生——如果比爾·蓋茨就這樣行走在大街上，大概一大半人不會覺得這是當今世界首富之列的人，相反我們會以爲剛從身邊走過去的那位衣冠楚楚者更有經濟實力。

從這個意義上講，修飾着裝，從來就不只是一種自我心理滿足的行爲，還有着更爲複雜豐富的社會內涵。

# 魯迅眼中與筆下的香港

周惠斌

二〇〇六年九月，《魯迅是誰》圖片展在香港時代廣場展出，展覽以黑白爲基調，重播了一代巨人的重要足跡，敘述了中華「民族魂」的偉大人生，讓人們感受到魯迅作爲常人的情感世界，更展示了這位文壇巨匠的愛好和才華，給人以心靈的震撼。誠如其時香港立法會主席范徐麗泰所說的，魯迅是中國民衆和知識分子最敬仰的人，作爲中國二十世紀思想文化巨人，他的寶貴遺產屬於中國每一個人，理應爲香港同胞所繼承。

其實，早在八十年前，魯迅就曾與香港有過三度接觸。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七日，魯迅由廈門乘船前往廣州，擔任中山大學教務主任兼文學系主任，途中路過香港，隨船停泊在維多利亞港一宵。但魯迅並未上岸，只是獨自默坐在艙房裡，一邊翻讀報紙一邊喝茶。直到夜幕降臨後，他才踱步到船艙口，凝眺港灣的夜色。但見遠處影影綽綽的山巒，儼如一尊天然的迴音壁，魯迅在恍惚之間，依稀感覺到風濤中傳來歷史的嗚咽之聲、悲號之聲、吶喊之聲……

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七日，魯迅從廣州前往香港，同行的有葉少泉、許廣平等。接待他們的是香港大學的青年學子趙今聲，他是工科學生，兼任基督教會的《大光報》社外編輯。當時正值省港罷工之後，英國當局強化殖民主義統治，香港的社會空氣窒息。爲了打破這種窒息，趙今聲通過在廣州的友人葉少泉與魯迅取得聯繫，並以《大光報》的名義，邀請魯迅赴香港演講。魯迅欣然答應，並下榻在港島太平山麓（必列士街五十一號）基督教青年會的崇樓傑閣內。

但是，香港的洋主子及其洋奴之輩，並不喜歡兼且畏懼魯迅這個名字，他們在公開干涉無效之後，便暗地裡「派人索取入場券，收藏起來，使別人不能去聽」，以此進行阻撓和搗亂。

二月十八、十九日，魯迅先後在香港大學及香港青年會作《無聲的中國》、《老調子已經唱完》兩個經典演講，一時轟動香港及大陸文壇。在演講中，魯迅號召青年們拋棄封建文化糟粕，引導青年們注重社會的現實。魯迅說：「中國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換來的」，「現在聽說又很有別國人在尊重中國的舊文化了，哪裡是眞在尊重呢，不過是利用」，「也就是一把軟刀子」。「什麼八股咧，道學咧，和社會，百姓都不相干」，要拋棄這老調子，「看一看社會怎麼樣，世界怎麼樣」。「青年們先可以將中國變成一個有聲的中國。大膽地說話，勇敢地進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開了古人，將自己的眞心的話發表出來」。「只有眞的聲音，才能感動中國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須有了眞的聲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顯然，這是魯迅振興民族的呼聲！

由於兩篇演講「攻擊國粹，得罪了若干人」，也得罪了香港的洋主子，因而港英當局對魯迅的演講非常憎恨，竟不許講稿登報。後幾經交涉，儘管當局作了讓步，但還是表示必須刪改後才可以刊登。

演講期間，年輕的主持人曾與魯迅聊起香港文壇的現狀，當說到有人稱香港乃「文化沙漠」之地時，魯迅卻「頗不以為然」，認爲這種說法「未免太頹唐了」，並表示將來的香港是不會成爲文化上的沙漠之區的。

魯迅這次在香港駐足了三天。由於跌傷的腳還未全好，不能到各處大街上閑走，所以對香港的市井俗風等，印象比較淡薄。不過，魯迅回廣州後寫了一篇《略談香港》的文章，他以當地《迴圈日報》上披露香港「警司」隨便向中國人「抽藤條」、「搜身」等屢見不鮮的事實，稱「香港總是一個畏途」；同時，他還寫到在香港帶着書籍的人的困難，因爲一不小心會被指爲「危險檔」。

魯迅最後一次香港之行，是在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八日，他從廣州遷居上海時路過香港。魯迅這回隨身帶着幾隻書箱、衣箱，二十九日下午竟挨了「查關」的種種麻煩。

當晚，魯迅在赴上海的輪船上寫了《再談香港》一文，記述他這次途經香港時遭到洋人和奴性同胞「查關」的無理待遇。「我出廣州，也曾受過檢查。但那邊的檢查員，臉上是有血色的，也懂得我的話。每一包紙或每一部書，抽出來看後，便放在原地方，所以毫不凌亂，的確是檢查。而在這『英人的樂園』的香港可大兩樣了。檢查員的臉是青色的，也似乎不懂我的話。他只將箱子的內容倒出，翻攪一通，倘是一個紙包，便將包紙撕破，於是一箱書籍，經他攪鬆之後，便高出箱面有六七寸了。」更令他氣惱的是，一把連柄長僅五寸三分的小刀，竟被檢查員說是「兇器」；一盒蚊煙香也被指斥是「古怪」的。船上的茶房將這翻箱倒篋的事，歸咎於魯迅，他說：「你生得太瘦了，他疑心你是販鴉片的。」文章結尾魯迅發出了對香港統治當局的強烈憤慨：「香港雖只一島，卻活畫着中國許多地方現在和將來的小照：中央幾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頌德的『高等華人』和一夥作倀的奴氣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能耐的死在洋場上，耐不住的逃入深山中，苗瑤是我們的前輩。」

如今，香港這顆東方明珠已經建設得無比璀璨，魯迅若地下有知，定會感到萬分欣慰。而他如能再赴香港，興許會寫出《三談香港》的雜感，爲香港的今天、明天而喝彩、祝福！

今日香港 （攝影）楊芳菲

# 國產電視劇重新受寵

蕭 愚

曾幾何時，歐美大片、日韓言情片等外來劇充斥着內地的電視熒屏，看日韓劇成爲白領中的潮流，劇中人成爲都市青年的偶像。

隨着《亮劍》、《士兵突擊》、《金婚》、《我的團長我的團》、《潛伏》等一大批國產精品電視劇的熱播，國產電視劇重新受到市民的寵愛。那些曾經的日韓劇的「粉絲」們，也開始「譁變」，成爲國產電視劇的鐵桿「粉絲」。

作爲一個影迷，姜某曾經一度將「中劇」打入冷宮。在他眼中，「國產情景劇連笑聲都特假。而國產警匪劇，情節拖沓，邏輯離譜，演員造作」。他的書櫃上，排得密密麻麻的碟片中，美劇佔了多一半，《二十四小時》、《越獄》、《迷失》、《英雄》……都是美劇迷們耳熟能詳的經典。而女友百看不厭的日劇韓劇則瓜分了剩餘空間：《交響情人夢》、《我的名字叫金三順》……都是日劇韓劇粉絲的最愛。

在「洋劇」迷們的眼裡，物以類聚人以「劇」分，看劇，代表着不同品位。美劇類型衆多，內容豐富，品位最佳；日劇情節緊湊，題材新穎，次之；韓劇雖然拖沓冗長，但打上了「時尚浪漫」的標籤；再下來是港劇，偶爾能有《金枝慾孽》之類的精品出現。而看國產劇是「沒品」的事情，「古裝戲紮堆，苦命女人扎堆，盡瞎編些漏洞百出的故事給中老年人打發時間」。

有意無意間，許多年輕人都把國產劇拒之門外。

但不知不覺中，《亮劍》、《士兵突擊》、《潛伏》……的出現，讓人們對國產電視劇開始刮目相看。如今，在姜某的書櫃裡，國產電視劇碟片也是越積越多。此外，他還發現，身邊的若干「洋劇」的「粉絲」們花在國產電視劇上的時間也已經在「超日趕美」了。

前一段時間，內地《潛伏》熱播的時候，無論在哪間辦公室裡，隨口提一句《潛伏》，話題竟然就全然煞不住了，男人聊《潛伏》裡的諜戰，女人談《潛伏》裡的愛情，「一桌男女老少，竟然全是『潛艇』（潛伏粉絲）。」

其實，再往前追述，《士兵突擊》熱播的時候，「不放棄，不拋棄」成了全民口頭禪。《金婚》則被年輕觀衆奉爲生活教科書，並引發了關於愛情和婚姻的大討論。《我的團長我的團》的方言與普通話「混搭」亦讓大家議論不停。

似乎一夜之間，看中劇，成爲一種流行時尚。

事實上，中劇復興之時，也是海外劇吸引力漸弱之刻。《急診室的故事》等美劇已走向尾聲，能引發話題的新劇卻寥寥無幾。同時，美劇按季播出的方式，也讓人着急。「而國產劇看起來很痛快，周一到周五，一個晚上連播兩三集。」一位市民如是說。

同樣，日劇過於精短，不符合內地觀衆的收視習慣，很難成爲茶餘飯後的話題。韓劇的拖沓冗長和情節雷同則是久被詬病的「致命傷」。新鮮感一過去，日韓劇的退潮也在情理之中。

如今，曾被痛斥爲「虛假做作矯情得要死」的國產生活劇，正以寫實、貼近生活的風格，重新贏得觀衆的寵愛。儘管某些國產電視劇或許看上去還不那麼完美，但其良好的整體創作趨勢卻讓人們看到了希望。

# 夢想就要No.1

流沙

一百多年前，法國巴黎要舉辦一個「萬國博覽會」，當時又逢法國大革命一百周年。法國政府決定要在「萬國博覽會」期間辦一件「極不尋常的事」。

什麼才是「極不尋常的事」？巴黎人全不知道。於是，法國政府向公衆徵集方案。有一個設計師名叫斯塔夫·埃菲爾，他提出建一個旗座，高達三百米，成爲全世界建築物之最。然後將法國國旗插上去，在高空中迎風飛揚。這個主意充滿了法蘭西民族主義色彩，贏得了政府官員極大的興趣。

結果斯塔夫·埃菲爾的方案在七百多個徵集方案中脫穎而出。當時，巴黎原埃菲爾鐵塔附近全是古建築，不乏有經典的文化建築，造一座鐵塔，眞的是一件「極不尋常的事」。

埃菲爾鐵塔一動工，就遭到市民的強烈反對，認爲造鐵塔會破壞周邊的風景。作家莫泊桑，還聯合了全國文學圈內的知名人士向政府抗議。

埃菲爾鐵塔在爭議、抗議聲中慢慢升高，當時所有人都認爲鐵塔是巴黎城裡的一個「怪胎」，是執政者頭腦發熱的結果。但是當鐵塔建成後，世界各地的人發現巴黎城裡矗起的高塔，紛紛駐足觀望，他們驚嘆這是全世界最高的建築物，在塔下合影觀光。埃菲爾鐵塔於是名噪全世界，慢慢演變成巴黎的地標。

埃菲爾鐵塔的誕生從來沒有得到過寬容和理解，它的成長過程充滿了「死亡」的危險。但是，法國政府當年一意孤行，唯一讓其堅持下來的理由是：這是全世界最高的建築物，他們在開歷史先河。如果沒有這一點，也許埃菲爾鐵塔早就會在罵聲中停止建造了。

敢爲人先，走前人沒走過的路，做前人未做過的事，並非那麼容易。如果沒有「No.1」的夢想在前面，很少有人會堅持走完一條泥濘之路。「No.1」不是空想，它既是一種方向，也是一種突破自我，肯定自我，銳意創新的最後依靠。不是斯塔夫·埃菲爾成就了埃菲爾鐵塔，也不是法國政府成就了埃菲爾鐵塔，而是「No.1」成就了它。

# 卸下不需要的東西

王兆貴

曾有人請教羅丹，怎樣才能把大理石雕刻成那麼傳神的雕像。他回答說，「這很簡單。你拿來一塊大理石，把不需要的統統砍掉。」這話說得確實「很簡單」，也有點幽默，細細想來卻不無道理。

我們知道，雕刻技藝本身，並非這麼簡單。然而，「把不需要的統統砍掉」，卻說盡了這項創造性勞動的全部內容。從這個意義上說，羅丹不愧爲深得要言妙道的大師。其實，人生也是一門藝術，同樣講求刪減冗餘之道，卸下不需要的東西。

當初我們來到世上，本來是赤條條空無一物。隨着年齡的增長，身心的掛礙也逐漸多了起來。看到什麼都是新鮮的，都以爲是自己需要的，什麼都想收藏，什麼都想保留。在物資短缺的年代，也許還感覺不到這樣的生活習慣有何繁複和累贅。但當時代的列車將我們載入新的世紀，帶進物慾橫流的市場大海，人們的視覺、聽覺、味覺、嗅覺、觸覺都被充分激活了，異乎尋常地亢奮起來。隨後，便出現了房奴、車奴、卡奴等被消費異化了的怪現象，繁複和累贅之感也相伴而生。

被時尚牽着鼻子走的人，在眼花繚亂的商品和吊胃口的廣告面前，購買慾望剛開始還比較強勁，時日久了，便逐漸失去了選擇的能力和耐心，許多人都很難說清自己眞正需要什麼。在人們的心智普遍被商業異化的時代，海明威告誡人們，「在一個奢華浪費的年代，我希望能向世界表明，人類眞正需要的東西是非常之微少的」。他不能相信內心生活眞實而嚴肅的人，對物質會有那麼多的需求，對物質的狂熱追求，反而說明了我們內心的空虛。

「家有黃金數噸，吃飯睡覺不過一間」。若以此對照起來，我們生活中不需要的東西確實太多了。所謂「不需要」的東西，應該包括看得見與看不見兩個方面：用不上的雜物、能省略的俗務、可忘掉的瑣事，尤其是頭銜、名分等原本就不屬於你的附加東西。這些冗餘的身外之物，當屬來之不易，難以割捨也是人之常情。因而我們常常會聽到這樣的說詞，「先留着、別扔掉，不定什麼時候就能用得着」。由於這種寧濫毋缺的心理作怪，有些人就如同拾荒者那樣，一路上只管撿拾起來，總也不肯捨棄，以至於背負越來越重，步履越來越慢。

不論你是棟樑大器，還是凡夫俗子，同樣是紅塵路上的匆匆過客，時光有限，精力有限。舊物累積，俗務纏身，瑣事縈懷，虛名拖累，不僅浪費了有限的時間和空間，擠兌了有益作爲的精力，讓人身心疲憊，而且也必然會沖淡人生的主題，淹沒人生的價值。在看重生命質量的前提下，撥冗除雜，刪繁就簡，適時卸下那些不需要的東西，你才能輕鬆愉快地前行，實現人生價值最大化。

卸下冗餘的東西，回歸簡單的生活，其實是一種全新的生活哲學。當你用一種新的視野觀察生活、對待生活，你就會發現許多簡單的東西才是最美的，而許多美的東西正是那些最簡單的事物。因此，美國暢銷書作家麗莎·普蘭特說，簡單的生活並不一定是物質匱乏，但它一定是精神的自在；簡單生活也不是無所事事，但卻是心靈的單純。這也許就是崇尚簡約的人所追求的人生境界，所嚮往的人生樂趣吧。